

「兩岸族」？大上海地區台商的國家認同

耿 曙*

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目的在針對大上海地區臺商的政治認同，進行嘗試性的探索。作者首先歸納相關資料，論證相當部分從事高科技產業的大陸臺商，尤其以大上海地區的從業人員為代表，往往表現出「台灣認同」日趨淡薄，或甚至轉而認同於當地身份的傾向。然而一則該趨勢並未見諸 90 年代晚期之前登陸的臺商（以珠江三角洲的臺商群落為主）。再則，此一發展方向，並非目前有關國家認同的相關文獻所能解釋。故此「認同轉換」乃成為本文探討的主題。針對上述發現，作者試圖回溯身份認同的根源，提出「原始忠誠」、「教化融合」、「階級關係」、「全球文化」以及「跨國資本主義」等五項假說，對大上海地區臺商的政治認同，展開嘗試性的理解。

*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Abstract

The paper seeks to explain the shifting political identity of Taiwan's investors in Mainland China. In particular, it targets those Taiwanese high-tech entrepreneurs in the greater Shanghai area. The study begins with a finding that the "Taiwan identity" of those investors—especially those running high-tech ventures in greater Shanghai—has been either transformed in China's favor or at least become less pronounced. The contrast is sharp between these investors and those leaving Taiwan a few years earlier and settling mostly in Zhu River Delta. But how to make sense of this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This paper bring in five hypotheses—such as "primordial ties," "state-building agent," "class relationships," "global culture," and "global capitalism"—to explain why national identity persists and adjusts. With these hypotheses, the next step of the research is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o testify these hypotheses.

壹、前言：作為「兩岸族」的台商

兩岸經貿往來的日漸增長，持續引起台灣當局的高度關切。或者憂心製造業外移，將導致台灣產業的空洞化。或者關切台灣經貿的「單向依賴」，因而喪失政治上的自主性。有鑑於此，方有 1996 以降的「戒急用忍」政策（張慧英，2000：211-228）。基於同樣原因，乃有近日（2002 年 3 月）有關八吋晶圓外移的持續論辯。除目前已見諸討論的兩岸經貿的政治影響（吳介民，1996；吳玉山，1997：119-70；周鉅原，2001；童振源，2004；耿曙、林琮盛，2005）之外，依作者所見，西進臺商對政治最直接衝擊，可能源於臺商的「認同轉變」（耿曙，2003；耿曙、林琮盛，2005；陳朝政，2005a；陳朝政，2005b）。換言之，此一快速擴大的社會群體，其國家認同是否將發生變化？若是，又究竟如何轉變？想像中「出賣台灣」或「以民逼官」的疑慮，已使得臺商的認同問題，成為台灣今日極敏感、極富爭議，但卻必須面對的問題（康彰榮，2001；王綽中，2001；耿曙，2003；陳朝政，2005a；陳朝政，2005b；鄧建邦，2005）。

有關臺商西進的政治後果，最引人關切者，莫過於高科技臺商。蓋此類高科技產業已為近年台灣經濟的命脈，且其外移對台灣未來的發展，造成莫大的威脅，故本文以此類臺商為主要探討的對象（耿曙，2003；耿曙、林琮盛，2005）。因近年該類臺商多有向大上海地區集中聚集的趨勢，本文因而以大上海地區從事高科技產業的臺商，作為研究的焦點。如前所述，本文首要的工作在發掘出臺商認同變遷的概況並描繪其變化的模式。根據作者的資料與訪談，不同於早些年西進的台灣企業主，此類高科技從業人員，正在快速融入當地的「中國」社會，期待中的「臺灣人認同」，正迅速夭萎，但何以致此？值得吾人深入探究（方孝謙，2003；陳朝政，2005a；陳朝政，2005b；鄧建邦，2005）。

但無論中外學界，迄仍未對此「經貿互動的認同政治」，提出較嚴謹的分析。目前國內外有關國家認同的論述，若非集中於「台灣認同的興起」問題（張茂桂等 1993；吳叡人 1997；江宜樺 2000；方孝謙 2001；林佳龍、鄭永年 2001），便係針對海外（Chinese diaspora）「華人認同」的持續與轉變（Tu. ed. 1994；Ong & Nonini eds. 1997；Ong 1999；Wang 1999）。而另方面，目前有關「民族認同」的文獻，多將認同的興起與變化，置於社會轉型中「國家構築」（state building）的脈絡，而傾向強調精英的無限想望與立意編造（江宜樺，2000；Albrow，1996/2001；Anderson，1991/1999；Gellner，1983/2001）。臺商們以其成長於認同彷徨的環境（「中」臺間的），置身於政社快速變遷的環境（引發「尋找新認同」的企盼），而今置身於同文同種的「中國」大陸，如何面對此融合的壓力（陳朝政，2005a；陳朝政，2005b）？

故臺商認同變遷的複雜程度，遠超過上述「認同論述」的範疇，現存類理

論是否有助瞭解臺商的認同變遷，則不無疑問（陳朝政，2005a；陳朝政，2005b）。本文對此將別追本溯源，別立蹊徑，以便深入探討臺商認同的個案。作者於是提出數項假說，嘗試對高科技臺商的認同轉變，提出可能的解釋，當然在更系統的實地調查之前，目前仍難對此對立假說，展開進一步的甄別。故本文乃為研究進展過程中的「期中報告」，有關臺商認同變遷的定論，仍待進一步的展開訪談，對上述假說，進行有系統的驗證。

根據上述的方向，本文的第二節首先回顧海峽兩岸經貿互動的現況，文中著重經貿交流對台灣方面所帶來的政治威脅，尤其是高科技臺商登陸所引發的種種憂慮。對此作者的看法為：中國大陸經由臺商所能施加的政治壓力，可能主要來自其對個別臺商的拉攏與遊說，希望經由臺商的歸順，對台灣政府展開「以商逼官」的攻勢。如此一來，則個別臺商的政治態度，便顯得極為關鍵。因為臺商們的「國家認同」將決定其是否為中共「促統」攻勢的馬前卒（耿曙、林琮盛，2005）。接著的第三節則將就地域分佈的角度，對登陸的臺商進行全面的鳥瞰，其觀察重點除對臺資的企業結構、目標市場、經理人特質等，加以勾勒外，並對其「國家認同」之趨勢，進行描繪。此處作者的發現為：近年西進的臺商們，尤其以大上海地區的高科技業者為代表，紛紛表現表現出「台灣認同」日趨淡薄，或甚至轉而認同於當地身份的趨勢。在接下來的第四節中，作者將對此趨勢，嘗試進行解釋。作者先援引目前有關的「民族主義」文獻，期自當中汲取分析的工具。但經過初步的檢閱後，作者發現：目前有關「國家認同」的討論，並無助解釋臺商認同的變化，作者因此必須追本溯源，自行提出有關認同起源與變遷的種種假說。因此作者乃利用本節後半，提出「原始忠誠」、「教化融合」、「階級關係」、「全球文化」以及「跨國資本主義」等五項假說，以為進一步經驗研究之張本（魏鏞，2003；石之瑜編，2003）。

貳、為何關注台商：兩岸經貿互動的衝擊

一、兩岸經貿的發展

兩岸經貿互動可回溯到台灣在 80 年代晚期的經濟困境，隨當時新台幣匯率的大幅升值，使得台灣出口商品之競爭力為之下降，加以同期間內製造業工資大幅上漲，更加以廠房土地取得不易，地價偏高，勞力密集產業的經營成本因而直線上昇。廠商乃被迫遠赴海外尋找勞工供給豐富、工資及地價便宜的生產基地，以延續台灣勞力密集的製造業的生存。在 1980 年代晚期，兩岸政府均放寬對經貿互動的限制後，臺商對赴大陸投資設廠乃開始大幅增長。隨著臺商的投資而來的是對大陸出口的大幅擴張。由於台商在大陸投資的大幅成長，自台灣進口

的機器及中間產品亦隨之快速增長。在進口方面，則由於台灣管制自大陸的進口，因此臺商製成品返銷台灣的機會有限，自大陸進口金額不但不大，成長也慢，因而使台灣與大陸之間的貿易享有大量的出超（李非，2000：82-104；童振源，2000；童振源，2003）。

由於兩岸分處高低不同的分工水平，在生產要素間具有相當程度的互補性，加以語言文化的溝通障礙較小，自 80 年代晚期以來，台灣勞力密集的加工業迅速移往大陸，導致台商從原來在台製造、出口歐美的生產模式，轉變為台灣出口機械及中間貨品（如半成品、特殊原料等）到大陸，然後利用大陸廉價人工及土地等加工要素，進行生產，最後再出口歐美的模式，因此幫助創造大陸對歐美的大量出口。在此形勢下，台灣對大陸經貿的依賴程度亦同時快速增加，就貿易依存度而言，1993 年台灣對大陸的出口已超過出口的 15%，到了 2000 年，台灣對大陸的出口已超過總出口的 17%，僅次於對美國的出口。但就貿易順差而言，大陸已成為台灣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2000 年貿易順差達 2,000 億美元。可說這一切均是登陸臺商所創造的成果。

二、兩岸經貿整合的經濟影響

如前所述，兩岸經貿互動日趨密切，造成台灣方面的不少疑慮，或者憂心產業的「空洞化」（hollowing out）、或者擔心國內投資不足，成長期的景氣低迷、或者焦慮大陸製造業的快速成長，成為台灣企業的競爭對手等。但根據近五年來，兩岸經貿互動的情形，上述的經濟危機，並未成為事實。首先，產業空洞化的情況並未在台灣出現。依照出口商品的技術密集度觀察²⁸，過去三年中，台灣中高技術密集度的高科技產品外銷比重日增，顯示台灣產業升級成效明顯（童振源，2001：43-49），產業空洞化的現象並未出現。

其次，台灣資金外流情況逐漸緩和。自 1993 年台灣許可合法間接商業匯款（不同於往日之私人小額匯款）以來，兩岸雙向匯出匯入的美元金額就年年攀高。以 2000 年為例，由台灣向大陸匯出的美金達 6.98 億美元，而由大陸向台灣匯回的也有 7.70 億美元。如果再考慮以台灣接單、大陸出貨方式所賺的外匯，則台商赴大陸投資所引發的長期資金外流情況，並不如想像中嚴重。兩岸金融往來日趨密切，並未發生「錢去中國、債留台灣」的問題。²⁹ 最後，就長期觀察，海峽兩岸的貿易往來，亦逐漸發生結構性的變化，由於近年來台商在大陸本土化就地採購的情形逐漸增加，昔日以投資帶動貿易（investment-driven trade）的比重下

²⁸ 根據一般經濟學者的看法：直接或間接外銷壓力本身，不必然會帶來促進產業進步的效果，不過外銷能力可以作為容易檢驗並可信的效率標準。

²⁹ 同時依照童振源的研究，當臺商對大陸的投資大幅擴展之際，並未減少對台灣國內的投資（2001：39-41）。

降，中臺間的貿易逆差與過高的依賴，應可逐漸得到改善。

由上述的討論中可知，兩岸經貿的密切互動，並未在經濟上對台灣造成重大的威脅。兩岸經濟的日漸整合，最值得憂慮者，可能並非經濟安全方面，反而是台灣在政治上的喪失自主性。此留待下節討論。

三、兩岸經貿整合的政治影響

更令許多人憂心者，乃是台灣由於與中國大陸的經濟整合，將在政治上喪失其自主性(陳義彥、陳陸輝，2003；耿曙、林琮盛，2005)。我們由許多相關報導中得知，「以民逼官」、「以商促統」確為中共決策者的如意算盤。有鑑於此，乃有 1996 以降的「戒急用忍」政策 (張慧英，2000：211-228)。基於同樣原因，亦方有近日 (2002 年 3 月) 有關八吋晶圓外移的持續論辯 (吳玉山：1997：162)。但是否大陸可以臺商為人質、以切斷兩岸經貿為要挾，迫使台灣作出政治上的讓步呢？

首先，如前所述，台灣對中國大陸的經貿依存程度的確偏高。但另方面以大陸公布之數據看來，台灣在大陸的投資金額已佔其所有外資的第二位，僅次於香港。海峽兩岸的經濟往來，實屬互賴關係。此一則由於台灣對大陸的出口，多屬製造設備、中間產品、及資本財，均絕對有助於中國大陸的出口創匯。且一旦中間環節停頓，或將產生連鎖反應，造成更廣泛的製造業危機。因此北京政府若貿然動用切斷經貿往來，以為要挾的手段，則中國大陸的出口與整體經濟景氣，必將受害甚深。³⁰ 其次，貿然切斷經貿往來，亦將對整體的國際形象，造成極嚴重的破壞，使得外資裹足不前，造成經濟停頓，其損失何可勝數。因此根據一般專家學者的共同體會，北京政府若非已屆兩岸攤牌、武力相向的地步 (吳介民，前引文：232)，否則，應不致貿然動用全面切斷經貿往來為對臺施加政治壓力的手段 (吳介民，1996；吳玉山，1997：119-70；童振源，前引文：54-68)。

除目前已見諸討論的兩岸經貿的政治影響之外，依作者及幾位學者的觀點 (吳介民，1996：214；童振源，前引文：68-70)，兩岸經貿互賴對台灣政治最直接衝擊，極可能源於臺商的「認同轉變」。換言之，對台灣而言，經貿「全面」中斷的危機，並不特別嚴重。中共反而極可能利用選擇性的獎勵與壓迫 (胡蘿蔔加巨棒) 為手段，「選擇性」的爭取部份臺商，建立起影響對臺工作的管道。誠如吳介民所言「運用跨海峽政商關係所產生的利益團體，進行政治遊說和宣傳」可能是「影響台灣大陸政策」的主要管道。而童振源亦徵引中共領導人的談話以為證明，「在經濟交往的過程中，未來台灣地區的政治將出現一群和大陸具有密切關係的利益團體」、「要以發展經濟關係影響政治，以民間影響官方」(前引文：

³⁰ 根據童振源的研究 (同前文：65)，由於臺資集中於江蘇、廣東、福建數省。北京若輕舉妄動，則上述諸省將嚴重受創，而該數省又恰為中國大陸的經濟命脈，北京政府因此必將投鼠忌器。

68)。可見此類壓力，並非空穴來風。

對此，作者並不能同意吳、童兩位過於樂觀的態度，或認為此類跨海峽政商網絡，並非北京所能掌握（吳），或以為加入WTO後，中共將無法以特殊優惠或歧視，爭取臺商的歸附。依作者所見，臺商是否能歸心於「中國」，必須有賴於臺商們個別的「國家認同」。若其「心向台灣」，則中共將難以吸收其為遊說的力量，若其「認同改變」，則不待中共之爭取，彼等將自動為兩岸的政治整合服務。觀察張榮發及許文龍兩位，在面對中共的壓力下，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吾人由此可知，對於抵擋中共的個別壓力，臺商本人的政治態度，實居於關鍵的地位。

參、兩岸族的地域結構：企業形態與政治認同

目下的台灣社會，對登陸臺商的認知，依然停留在「東莞臺商」的層次（李道成、徐秀美，2001；商周編輯顧問，2001）。同樣的，台灣學界對此新興社群的研究，也主要以數年前西進者為對象（鄭陸霖，1999；天下編輯，2002；吳介民，1996；朱燕華、張維安編，2001；Wu, 1997）。根據既定的刻板印象，「大陸的台灣人」多為小企業主，經營勞力密集的製造業，資金、技術多數來自台灣，主要針對美、日出口生產。他們張口便是閩南語，滿嘴不離檳榔果。他們的社交，往往也僅限於臺人的圈子，除此之外，上門攤派的腐敗官僚、搖尾乞憐的工廠員工，便構成他們生活世界裡僅有的「中國人」。這些臺商在兩聚會時，往往不免要報怨「中國人」如何愚昧、如何惡劣、如何難以相與。他們與當地人接觸的經驗，往往使其深切感受兩岸的「差異」，因而益加堅定其原有的「台灣認同」（康彰榮，前引文；鄭陸霖，前引文；Wu 前引文）。

對此粗略的「臺商印象」，基本符合三、四年甚或更早以前的情況。但經過近年登陸臺資的快步成長，加以西去臺商的日漸多元，上述印象早已嚴重失實（鄧若寧，2001；李非，2000；天下編輯，前引書；仲南強，2002）。由下列的表二中可知，江蘇省，尤其是以大上海地區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近年來已經成為臺商的投資中心。

表一 台灣歷年對大陸地區投資分區統計表

地 區	件 數	佔件數比率	核 准 金 額	佔核准金額比率
江 蘇	5,980	24.64%	7,434,920	37.00%
廣 東	8,512	35.07%	6,867,235	34.18%

福建	3,139	12.93%	1,797,788	8.95%
河北	1,730	7.13%	1,105,719	5.50%
浙江	1,244	5.13%	941,331	4.68%
其他地區	677	2.79%	431,980	2.15%
山東	673	2.77%	419,855	2.09%
東北地方	574	2.37%	282,821	1.41%
四川	380	1.57%	269,106	1.34%
湖北	421	1.73%	203,163	1.01%
海南	317	1.31%	129,032	0.64%
湖南	254	1.05%	125,657	0.63%
廣西	172	0.71%	44,702	0.22%
河南	197	0.81%	39,634	0.20%
合計	24,270	100.00%	20,092,943	100.00%
東莞	2,567	30.16%	2,195,831	31.98%
深圳特區	1,924	22.60%	1,435,350	20.90%
廣州	1,025	12.04%	887,285	12.92%
珠海工業區	186	2.19%	140,300	2.04%
廣東省小計	8,512	100.00%	6,867,235	100.00%
廈門	1,114	35.49%	708,503	39.41%
福州	657	20.93%	367,903	20.46%
福建省小計	3,139	100.00%	1,797,788	100.00%
上海	3,055	51.09%	2,847,374	38.30%
南京	351	5.87%	208,404	2.80%
江蘇省小計	5,980	100.00%	7,434,920	100.00%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審會，單位千美元

近三、四年來，「常居大陸」的臺灣人—尤以旅居大上海地區的台灣人為典型—早已褪盡「東莞臺商」的本色，在以下數方面，發生了巨幅的變化（陳彬，2000 & 2001；陳婉瑜，2001；田媛，2002；張家銘、吳翰有，前引文；莊素玉、陳卓君、陳昺豪等，2001）。首先，後到的這一群台灣人，無論在投資或就業管道方面，均展現出多元風貌。他們之中的多數，並未進入勞力密集的製造業，反而越來越多受僱於高科技產業、金融物流等服務業、及其他各式各樣針對大陸市

場的服務業部門（例如自營舖面）。同時，他們的僱主，也不再局限於臺資企業主—他們之中，有越來越高的比例為跨國企業，甚至大陸老闆工作。

其次，近年登陸的臺商們，較諸他們的前輩，一般均年輕許多，就其教育程度而言，也明顯有別於早年西進者。他們之中，「黑手變頭家」式白手起家的業主，已不再是主流，較多的是受過大專甚至大專以上的專業人員。也因此他們的生涯規劃，遠不同於早他們數年西進的台灣人，此為其另一項特色。蓋這批近年登陸的臺商，多數著眼於大陸的廣大市場，預備在其中安身立命，計劃長期甚至終身的發展。最後，近年登陸臺商的「國家認同」，也明顯有別於他們的先進。近年湧入大陸的一批台灣人，往往表現出「國家認同淡薄」及「彼此界限泯沒」。此特徵同時表現為與當地人不同的相處模式：他們之中，已經少見「過客」與「自我封閉」的心態，取而代之的做法是積極拓展當地的社會關係，努力將自身融入大陸的社會中。同時，早期臺商對當地人的種種歧視心理，也逐漸消弭於無形（陳婉瑜，2001；金碧，2001；萬瑞君，2001a & 2001b；臧聲遠、季欣麟，2000；莊素玉、陳卓君、陳昺豪等，前引書）。

表二將上述的兩波臺商的特性，加以扼要對照。其中第二波的臺商，基本上處於上述兩者之間，是兼具兩波臺商的特質。

表二 三波臺商特徵的對照

投資階段	第一波/萌芽期	第二波/過渡擴張期	第三波/深化轉型期
跨越時間	1987-1992	1993-1997	1998 迄今
產業內容	勞力密集（初級加工）	勞力/資本密集	資本/技術密集（研發量產）
針對市場	國際/外銷市場	國際及國內市場並重	國內/內銷市場
企業規模	獨資中小企業	大中小型企業兼備	中大型、集團上市企業
經理人員	教育程度低被迫西進	前後兩階段經理人的混合	教育程度高且多自願西進者
分佈區域	東南沿海為主（珠江三角洲 充實東南沿海（蘇南的崛起）及福建為大宗）	長江三角洲成臺資匯聚的中心並向內地零星擴散	心並漸沿海岸向北延伸。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肆、認同差異與變遷的理解：相關解釋及研究假說

一、認同變遷與現存理論

前述臺有關商認同的發現，是否可藉由目前針對「國家認同」的相關理論，得到充份的理解？本節前半將對此進行扼要的文獻檢閱。由於相關理論的不足，作者將利用本節後半，追溯認同的本質及其起源，藉以發展出有助理解臺商認同變遷的數項假說。

作者原希望自目前有關「民族主義」連篇累牘的文獻中，汲取部分概念與啓示，藉以對國家認同的產生與變遷，提出有系統的理解。但檢閱文獻的結果，依作者所見，目前有關「國家認同」的討論，並無助解釋臺商認同的變化，作者因此必須追本溯源，自行提出有關認同起源與變遷的種種假說。作者在此參考 Geoff & Suny eds. (1996)、Gellner (1996/1998)、Harman (2001)、Hutchinson & Smith eds. (1994 & 1996)、江宜樺 (2000)、林佳龍、鄭永年編 (2001)、汪宏倫 (2001)、吳叡人 (1997)、徐迅(1998) 等著作，對相關文獻，先進行扼要的回顧。

首先，民族主義所催生的「國家認同」，其最基本的訴求為「政治單元與民族單元必須一致」(Gellner, 1983/2001:1；Hobsbawm, 1990/1998:13)。換言之，「國家認同」必須歸結到民族國家的建立。但吾人由前述臺商個案中可知，臺商的認同變遷，並未涉及追求單一民族國家的過程，甚至任何政治層面的訴求，均與臺商們的國家認同無關。故其認同變遷，是否能在民族主義的理論框架中，得到較好的理解，因此頗成疑問。

其次，目前有關「國家認同」的討論，根據作者的歸納，可分為以下幾類主要的觀點。吾人可先檢討其理論大家 Ernest Gellner 傾向「功能論」式的分析，是否有助臺商認同的理解 (Gellner, *ibid.* & Gellner 1997/2001)。根據 Gellner 的看法，民族主義與因此而產生的「國族認同」觀念，皆孕育於由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的歷程中，在此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單一的政治單元」、「有力的國家機制」、「相互溝通的工具」—Gellner 稱之為「高層文化」(high culture) 等，皆為現代工業社會所必需。同時現代工業資本主義亦需一種有力的意識形態，以辯正其統治的正當性。因此根據 Gellner 的看法，「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實皆為現代化過程的產物。但 Gellner 分析的理路，卻並無助對臺商認同變遷的理解—臺商認同的變遷，既非誕生於大規模的社會變遷中，亦非起源於任何社會組織的功能需求。Gellner 對「國家認同」的分析，因而無法對前述發現提供直接的解釋。

再其次，則為以 Anthony D. Smith 為最重要代表的「原生認同」觀點。Smith 雖接受「國家認同」存在主觀成份，但強調其必須建構於特定的種族/歷史記憶之上，並非可被「任意想像」(Smith, 1986；Hutchinson & Smith eds. 1996: 40-45)。

因此對 Smith 而言，「國家認同」的形成，必須借助於共同的語言工具、生活方式、歷史記憶、起源傳說、文化象徵、及居住家園等，方能產生共屬一體的感覺 (Smith 稱之為 ethnic community 或 ethno)，成為「國家認同」的基礎。對照前述的臺商認同問題，則吾人可知，既存的「族群概念」，雖有助瞭解「國家認同」的持續，卻無益理解「國家認同」的變遷。具體而言，近年登陸臺商所形成的新認同，應無關於任何既定的「族群概念」，否則將無法理解為何前些年登陸的臺商們，並未基於類似的「族群概念」，發展出相仿的認同。³¹ 因此 Smith 所代表的「原生認同」觀點，恐亦無法直接解釋臺商們的認同變遷。

再看另一位大家 Benedict Anderson。彼極有技巧的融合 Smith 所代表的「原生認同」觀點 (primordialism) 與 Gellner 所開創的「建構認同」(constructivism/instrumentalism)。³² 根據 Anderson 的看法，「在積極的意義上促使新的共同體成為可想像的，是一種生產體系和生產關係（資本主義），一種傳播科技（印刷品），和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個因素之間半偶然的，但卻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Anderson, 1991/1999, 頁 53)。在此交互激蕩的三種力量中，其第一項（資本主義體系），較接近 Gellner 的看法，而其第三項因素（語言的歧異）又照顧「原生認同」觀點。以此觀之，其別出機杼的獨特處，在於強調「印刷媒介」的力量 (Anderson 稱之為 print-capitalism)。其認為在自我認同的追尋與建構的歷程中，往往具有極大「想像」的成份，而激發此類集體「想像」的泉源，則必須依附「印刷媒介」對特定觀念的大量流通，如此方能蔚為潮流。若再回頭檢查臺商的認同的轉變，吾人可發現，其過程並未涉及媒體對民族象徵的散佈與民族情緒的激發，故對於臺商認同的變遷，「印刷媒介」似未扮演關鍵的角色。因此 Anderson 的觀點，對本文的分析亦無明顯助益。

其餘民族主義文獻的重要論點，則多為更甚於 Gellner 及 Anderson 等人的「建構認同」觀點者，如 Eric Hobsbawm 與 Paul Brass (Hobsbawm, 同前書；Hutchinson & Smith eds. 1994 : 76-83 & 83-89) 往往強調「族群概念」的偏頗及任意的程度，對如歷史記憶等的任意選取與詮釋，而在詮釋的過程中，國家機關與政治精英扮演極關鍵的角色，其操縱與策略，對全社會「國家認同」的形成，產生重大的影響。然而此「國家中心」或「精英政治」的取向，並無法在臺商認同轉變的過程中發現—既未見明顯的「國家介入」，亦未見明顯的精英操縱、控制。因而此較極端的「建構/工具」觀點，對臺商認同變遷的解釋效力，似乎亦有時而窮。

二、有關臺商認同變遷的五項假說

³¹ 除非前後登陸的兩群臺商，其原生的「族群概念」本身，即存在重大的不同。本文稍後將對此展開進一步的檢討。

³² Anderson 顯然仍偏向後者，一般亦以其為「建構認同」觀點的代表人物。

以上所述，皆概括其總體趨勢而言，其中容有個別差異，但先來後到的兩波台灣人移民，就其「國家認同」而言，彼此的差距，實屬歷歷可辨。然進一步探究，則吾人應如何理解此兩群體間「國家認同」面的巨大差異呢？根據以上的簡略文獻檢討，吾人可知，目前有關「國家認同」的討論，並無助解釋臺商認同的變化，作者因此必須追本溯源，自行提出如下五項有關認同起源與變遷的種種假說，即「原始忠誠」(primordial ties)、「教化融合」(state-building agents)、「階級關係」(class relationships)、「全球文化」(global culture)、以及「跨國資本主義」(global capitalism)。³³ 由於篇幅與時間的關係，作者只能極簡要的交代如下。

首先為「原生認同」模型 (Smith, 1986; Hutchinson & Smith eds. 1996: 40-45)。此說以認同內涵不易因外燐原因而改變，強調外省人與本省人，在「台灣認同」方面所表現出的重大歧異。認為台灣的外省人由於其對中國大陸的感情，較傾向於投資中國，而另一方面，外省人由於種種原因，一般教育水平較高，結果產生與高科技資本主義結合的傾向 (林忠正、林鶴玲，張茂桂等，1993：101-60)。故根據此一觀點，屬於本省人的「小頭家世代」／「第一波臺商」自然將表現出「台灣認同」顯著的特徵；而次一批登陸的「資訊人世代」，則應外省人充充斥，而表現出「認同中國」的傾向。

其次則為「教化融合」模型 (Wilson, 1984；並參考 Douw, Huang & Godley eds. 1999；Ong, 1999；Tu ed., 1994)。此觀點強調教育與社會化的力量，將觀察焦點置於近年西進台人的高教育水平，主張臺人政治認同的差別，其成形遠遠在登陸之前。西去的時機、地域及行業等因素，不過在「區別」這兩個本即不同的群體。換言之，此觀點將「認同模式」的差別，歸結於依附台灣教育體制所灌輸之「大中國主義」價值：此一「教化綱領」，雖成功改造許多年輕一代的心靈，然而對於年紀較長、教育程度較低的社會群體，其效力便有時而窮。由於台灣產業升級與工資起飛的壓力，後者（「小頭家世代」）早在 90 年初，便紛紛起而挺進東莞 (康彰榮，前引文；王綽中，前引文)。相對的，由於大陸市場的快步開發與台灣經濟的升級瓶頸，前者（「資訊人世代」），方於 90 年未奮進上海，認同差異因此形成 (陳婉瑜，前引書；金碧，前引書；萬瑞君，前引書)。

再其次則為「階級關係」模型 (黃毅志, 1999；並參考 Joyce ed. 1995；Tumin, 1967)。此觀點直指「認同的階級屬性」，認為族群的界限，仍必須依附於以經濟地位為核心的階層秩序。一旦階級區分泯滅，國家認同亦將頓失憑藉，終必日漸渙散、無法維繫。而就前述兩類登陸臺人而言，則「小頭家世代」與當地人士碰觸之時 (多數在 95、96 年之前)，仍分屬不同階級（「東莞臺商」的典型不妨視

³³ 以下討論，為求行文方便，僅標舉其特色，將第一波西進臺商暫稱為「小頭家世代」，而次一批登陸者則略為「資訊人世代」。

爲「小頭家」對「打工仔」)，因此「差異認知」與「自我認同」自將油然而生 (鄭陸霖，1999；康彰榮，前引文；Wu，前引文)。另方面則時不我予，待得台灣的「資訊人世代」與大陸的城市居民接觸之際 (多數爲 98、99 及其以後的事)，雙方的階級差距，早已遠不如昔日 (在大上海地區，似乎成爲「淘金客」對「原地主」了)。階級身份的差距既然日漸泯滅，國家認同也自然不再得到彰顯 (金碧，前引書；萬瑞君，前引書；莊素玉、陳卓君、陳昺豪等，前引書)。臺人社群的認同的差異，便屬由此而生。

第四爲「全球文化」模型 (Held, 1995，參考 Held, 2001；Krasner, 1999；Sassen, 1996；Shaw, 2000)。此觀點認爲身屬資訊社會中堅的科技族群們，側身於全球資訊網絡之中，所關注者厥爲國際市場之商機，所從事者厥爲跨國流動的營生，故絕不以狹隘的地域認同爲依歸。換言之，此觀點強調知識經濟與資訊社會的特徵，以爲置身其間的從業人員，同時將自身暴露於此全球文化的洗禮之下，不再爲特定的政治效忠所局限。就此而言，以東莞臺商爲典型的「小頭家世代」，仍屬傳統的「地域認同」一類；而大上海地區的「資訊人世代」，則早已超越、拋卻特定的地域認同，邁向新的「全球認同」(萬瑞君，前引書；王佳煌，2000；莊素玉、陳卓君、陳昺豪等，前引書)。但上述立場，乃本於樸素的「全球化」概念。較具反省深度的著述，則強調「全球化」與「地方化」間的相互激蕩 (Albrow, 2001；Bauman, 2001；Robertson, 1992；Tomlinson, 2001)。換言之，臺商們此時「置身國際」或「融入中國」的過程，或許正孕育著下一波的經過反省的「本土化/台灣化」呢。

最後爲「跨國資本主義」模型 (Friedman, 1999/2000；Rugman, 2000/2001；天下編輯，2002；Yeung & Sung eds. 1992)。此觀點立基於資本主義的「區域佈局戰略」。認爲投資地點的不同，反映不同的市場策略，而臺資亦不能自外於此全球資本主義的邏輯之外。因此前一世代的投資者，著眼於國際市場，對於中國大陸，僅在部份利用其人力、土地資源，因此選取接近香港 (國際商機匯集) 而爲中國邊陲的廣東地區，作爲投資生產的重心，而在心態上，也絕不發生「認同中國」的問題。而隨中國大陸的漸次開發，國際資本漸漸轉向爭取中國的國內市場，此時則不得不轉向以中國的中心—上海—爲投資的優先地點。此時由於心態的改變，爲能進一步爭取中國大陸的國內市場，自然必須要將心比心「認同中國」了。因此對中國大陸的兩種態度，實際上反映了中國大陸在國際經濟體系地位的變遷，而其背後的邏輯則是一致的：那裡有市場，就認同那裡。

伍、結論及未來研究方向

本文主要目的在針對高科技臺商的政治認同，進行嘗試性的探索。作者首先

歸納相關資料，論證多數從事高科技產業的大陸臺商，尤其以大上海地區的從業人員為代表，往往表現出「台灣認同」日趨淡薄，或甚至轉而認同於當地身份的傾向。然而一則該趨勢並未見諸 90 年代晚期之前登陸的臺商（以珠江三角洲的臺商群落為主）。再則，此一發展方向，並非目前有關國家認同的相關文獻所能解釋。故此「認同轉換」乃成為本文探討的主題。針對上述發現，作者試圖回溯身份認同的根源，並提出「原始忠誠」、「教化融合」、「階級關係」、「全球文化」以及「跨國資本主義」等五項假說，對臺商政治認同的變化，展開嘗試性的探討。但由於本研究並未涉及實地的經驗調查，使得本文所提出的五項假說，尚無法得到有系統的驗證。因此本文的價值，僅在初步的論證並提出可能解答的方向，至於更確切的解釋，則有待對本主題的更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一、中文著作

- 天下編輯 (2002),《競爭中國：金礦，還是錢坑？》。台北：天下。
- 方孝謙 (2001),《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探索》。台北：巨流。
- 方孝謙 (2003),〈全球化衝擊下大陸台商的認同問題〉，載《世貿組織與兩岸發展》，許光泰、方孝謙、陳永生編。台北：政大國關中心，頁 489-504。
- 王文靜等 (2001),《立業安家新中國》。台北：商智文化。
- 王佳煌 (2000),《資訊社會學》。台北：學富。
- 王綽中 (2001.11.29.),〈比關係靠基礎 爭取台商各憑本事〉，《中國時報》。
- 左原 (1996),〈兩岸貿易統計方法的探討〉，《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5 期，頁 1-14。
- 田媛 (2002.1.29.),〈明碁扎根蘇州 日益茁壯〉，《工商時報》。
- 石之瑜編 (2003),《家國之間：開展兩岸關係的能動機緣》。台北：新臺灣人文基金會。
- 仲南強/汪仲 (2002.1.15.),〈台商逐鹿中原快馬加鞭 前進大上海〉，《工商時報》。
- 朱新民、洪中明 (1992),《衝突？整合？海峽兩岸統一政策之研究，1988-1992》。台北：永然。
- 朱燕華、張維安編 (2001),《經濟與社會：兩岸三地社會文化的分析》。台北：生智。
- 江宜樺 (2000),《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
- 冷則剛 (1999),〈大陸經貿政策的根源：國家與社會的互動〉，載《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包宗和、吳玉山編。台北：五南，頁 211-63。
- 吳介民 (1996),〈同床異夢：珠江三角洲外商與地方之間假合資關係的個案研究〉，載《中國區域經濟發展面面觀》，李思名等編。台北/香港：臺大人口中心及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交流所，頁 174-217。
- 吳介民 (1996),〈經貿躍進，政治僵持？後冷戰時代初期兩岸關係的基調與變奏〉，《台灣政治學刊》，創刊號 7 月，頁 211-55。
- 吳玉山 (1997),《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台北：正中。
- 吳玉山 (1999b),〈台灣的大陸政策：結構與理性〉，載包宗和、吳玉山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修訂版，頁 153-210。
- 吳玉山 (2001),〈兩岸關係中的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中國事務》，4 月，第 4 期，頁 71-89。
- 吳新興 (1998),〈兩岸經濟整合的前景與評估〉，《經濟中華》。香港：中文大學

出版社，頁 113-130。

吳叡人（1997），〈民主化的弔詭與兩難？對於台灣民族主義的再思考〉，載游盈隆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台北：月旦，頁 174-217。

快樂工作人雜誌 Cheers (2002)，《搶不走的優勢：兩岸人才大車拼》。台北：天下。

李明軒、陳雅慧、盧智芳等（2001），《WTO 與兩岸競合》。台北：天下。

李非（2000），《海峽兩岸經濟合作問題研究》。北京：九州。

李威龍、王歲（2001），《前進中國的 10 堂必修課》。台北：先覺。

李道成、徐秀美（2001），《經商中國：大陸各地臺商的賺錢經驗》。台北：商訊文化。

汪宏倫（2001），〈制度脈絡、外部因素與台灣之「national question」的特殊性：一個理論與經驗的反省〉，《台灣社會學》，第一期，頁 183-239。

周大鳴（2001），〈論族群與族群關係〉，《人大報刊雜誌複印資料：民族問題研究卷》，第 5 期，頁 13-25。

周鉅原（2001），〈兩岸經貿的新架構與新思維〉，《中國事務》，第 3 期，頁 88-98。

林佳龍、鄭永年編(2001)，《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北：新自然主義。

林昱君（1997），〈論臺商對大陸投資統計問題暨發展趨勢〉，《中國大陸研究》，第 40 卷，第 11 期， 11 月，頁 40-67。

林德昌（1997），〈海峽兩岸的經貿投資與政經互動關係〉，《中國大陸研究》，第 40 卷，第 2 期， 2 月，頁 6-20。

林繼文、羅致政（1998），〈零和或雙贏？兩岸經貿交流新解〉，《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十卷第一期，頁 33-77。

邵宗海（1998），《兩岸關係：兩岸共識與兩岸歧見》。台北：五南。

邵宗海（2001），《兩岸關係：陳水扁的大陸政策》。台北：生智。

金碧/汪仲（2001），《客居上海：上海生活面面觀》。台北：商訊文化。

孫治本（2001），《全球化與民族國家：挑戰與回應》。台北：巨流。

徐中孟、姜守危、許宏濤（2001），《行銷中國》。台北：商周。

徐迅（1998），《民族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徐進鈺（1999），〈流動的鑲嵌：新竹科學園區的勞動力市場與高科技發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9 月，第 35 期，頁 75-118。

耿曜（2003），〈「連結社群」：WTO 背景下兩岸民間互動的分析概念〉，載《世貿組織與兩岸發展》，許光泰、方孝謙、陳永生編。台北：政大國關中心，頁 457-487 。

- 耿曜、林琮盛(2005),〈全球化背景下的兩岸關係與台商角色〉,《中國大陸研究》,第 48 卷,第 1 期,3 月號,頁 1-28。
- 耿曜、陳陸輝(2003),〈兩岸經貿互動與台灣政治版圖：南北區塊差異的推手？〉,《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6 期,11/12 月號,頁 1-27。
- 耿曜、陳陸輝(2003),〈兩岸經貿互動與台灣政治版圖：南北區塊差異的推手？〉,《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6 期,頁 1-27。
- 高長(1997),《兩岸經貿關係之探索》。台北,天一。
- 高長(1998),〈製造業臺商赴大陸投資與兩岸產業分工〉,《經濟中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237-254。
- 高長(2000),〈加入 WTO 後兩岸經貿互動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影響〉,《中國事務》,第 2 期, 10 月, 頁 43-55。
- 商周編輯顧問(2001a),《臺商傳奇：14 位深入大中國賺錢的企業家》。台北：商周。
- 商周編輯顧問(2001b),《到大陸作生意》。台北：商周。
- 康彰榮(2001.11.28.),〈大陸台商返台投票 意願不高〉,《工商時報》。
- 康燕(2001),《解讀上海, 1990-2000》。上海：上海人民。
- 張仲禮編(1998),《中國近代城市：企業、社會、空間》。上海：上海社科院。
- 張茂桂等(1993),《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國策中心及業強出版社。
- 張家銘、吳翰有(2000),〈企業外移與根留台灣：從蘇州臺商的經驗論起〉,《中國事務》, 10 月, 第 2 期, 55-71 頁。
- 張慧英(2000),《李登輝執政十二年, 1988-2000》。台北：天下。
- 張翼、聶佩進(2005),〈台商在大陸的發展狀況：以上海和江蘇為例〉, 載《2003 國情調研》, 中國社科院青年人文社科中心編。濟南：山東人民，頁 509-60。
- 莊素玉、陳卓君、陳昺豪等(2001),《明碁電通總經理李焜耀發現蘇州：高科技臺商蜂擁長江三角洲》。台北：遠見。
- 陳明璋(1998),〈兩岸三地經貿交流現況與展望〉,《經濟中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25-74。
- 陳婉瑜(2001),《工作在上海》。台北：經典傳訊。
- 陳彬(2000a),《我的上海經驗：從旅遊、投資到定居大陸的戰守策略》。台北：商訊文化，。
- 陳彬(2000b),《移民上海：我的台灣經驗遇上海派作風》。台北：商訊文化。
- 陳彬(2001a),《立足上海》。台北：時報文化。
- 陳彬(2001b),《上海商機》。台北：時報文化。
- 陳朝政(2005a),〈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東亞研究》, 第

- 36 卷，第 1 期(1 月號)，頁 229-74。
- 陳朝政 (2005b)，《台商在兩岸的流動與認同：經驗研究與政策分析》，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未出版博士論文。
- 陳義彥、陳陸輝 (2003)，〈模棱兩可的態度還是不確定的未來：台灣民眾統獨觀的解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46 卷，第 5 期，頁 1-20。
- 傅豐誠 (2001)，〈兩岸經貿互動形勢及其對台灣經濟的影響〉，國家政策基金會「兩岸關係圓桌論壇」論文集。
- 童振源 (2000)，〈台灣與「中國」經貿關係--經濟與安全的交易〉，《遠景季刊》，第 1 卷，第 2 期，1 月，頁 31-82。
- 童振源 (2003)，《全球化下的兩岸經濟關係》。台北：生智。
- 黃智聰 (2001)，〈海峽兩岸在加入 WTO 後的經濟關係〉，《中國事務》，第 6 期，10 月，頁 121-136。
- 黃毅志 (1999)，《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主觀意識：台灣地區不公平的社會階層體系之延續》。台北：巨流。
- 新境界文教基金會 (2001)，〈『一國兩制面面觀』座談會〉，《中國事務》，第 6 期，10 月，頁 6-23。
- 萬瑞君 (2001a)，《槍攻上海金飯碗》。台北：商智文化。
- 萬瑞君 (2001b)，《台灣人橫掃上海》。台北：世茂。
- 萬瑞君 (2002)，《台灣擋不住的改變：贏在 WTO 影響你之前》。台北：世茂。
- 臧聲遠、季欣麟 (2000)，《深入中國 I》。台北：遠見。
- 劉仁傑、封小雲 (1996)，《亞洲巨龍：臺、日、港投資大陸風雲錄》。台北：遠流。
- 鄭佩玉、陳慶鵬 (1998)，〈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城市群與港澳太經濟合作〉，《經濟中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465-87。
- 鄭陸霖 (1999)，〈一個半邊陲的浮現與隱藏：國際鞋業市場重組下的生產外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 月，第 35 期，頁 1-46。
- 鄧建邦 (2002)，〈接近的距離：中國大陸臺資廠的核心大陸員工與臺商〉，《台灣社會學》，第 3 期 (6 月號)，頁 211-251。
- 鄧建邦 (2005)，〈我們是誰？跨社會流動下中國大陸台商的認同〉，發表於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跨界流離：公民身分、認同與反抗」學術研討會，12 月 9~10 日。
- 鄧若寧 (2001.9.21.)，〈台商轉戰長江三角洲 占全體台資 10%〉，《東森新聞報》。
- 魏鏞 (2003)，〈台灣海峽兩岸互動模式之發展：歷史回溯、比較分析與制度建構〉，載《中國大陸：研究方法與成果》，何思因、陳德昇、耿曜編。台北：政治大

學國關中心，頁 343-405。

關野太郎（2000），《一個外商的中國經驗》。台北：遠流。

二、中文譯著

白曉紅譯，Chris Harman 原著（2001），《民族問題的重返》。台北：前衛。

朱雲漢、丁庭宇譯，Richard W. Wilson 原著（1984），《中國兒童眼中的政治：台灣地區兒童政治社會化的探討》。台北：桂冠。

李金梅譯，Eric J. Hobsbawm 原著（1996），《民族與民族主義》。台北：城邦文化。

李金梅譯，Ernest Gellner 原著（2001），《國族與國族主義》。台北：聯經。

李金梅譯，Ernest Gellner 原著（2001），《國族主義》。台北：聯經。

沈宗瑞等譯，David Held *et al.* 原著（2001），《全球化大轉變：全球化對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衝擊》。台北：韋伯文化。

吳叡人譯，Benedict Anderson 原著（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

周志杰譯，Montserrat Guibernau 原著（2002），《無國家的民族：全球時代的政治社群》。台北：韋伯。

高湘澤、馮玲譯，Martin Albrow 原著（2001），《全球時代：超越現代性之外的國家和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

常志宵、沈群紅、熊義志譯，Alan Rugman 原著（2001），《全球化的終結：對全球化及其對商業影響的全新激進的分析》。北京：三聯。

孫治本譯，Ulrich Beck 原著（1999），《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台北：商務。

張君玫譯，Zygmunt Bauman 原著（2001），《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台北：群學。

夏鑄九等譯，Manuel Castells 原著（1998），《網絡社會之崛起》。台北：唐山。

梁光嚴譯，Roland Robertson 原著（2000），《全球化：社會理論和全球文化》。上海：上海人民。

葉振輝、翁瑞庭譯，Henry Tudor 原著（1978），《政治謎思》。台北：幼獅。

蔡繼光、李振昌、雷達文譯，Thomas L. Friedman 原著（2000），《了解全球化：凌志汽車與橄欖樹》。台北：聯經。

鄭繁元、陳慧慈譯，John Tomlinson 原著（2001），《全球化與文化》。台北：韋伯文化。

顧駿譯，John Rex 原著（1991），《種族與族類》。台北：桂冠。

三、英文著作

- Boutin, J.D. Kenneth (1997). "Cross-Straight Trade and Investment: Economic and Security: Implications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sues & Studies*, 33: 12, pp. 70-93.
- Cheng, Tuan Y. (1996). "The Republic of China's High-Tech Export Control System," *Issues & Studies*, 32: 5, pp. 1-23.
- Douw, Leo. Gen Huang. & Michael R. Godley. eds. (1999). *Qiaoxiang Tie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Cultural Capitalism" in South China*, London & New York: Kegan Paul.
- Giddens, Anthony. & David Held. eds. (1982). *Classes, Power, and Conflict: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eoff, Eley. & Ronald Grigor Suny. eds. (1996). *Becoming National: A Reader*,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ld, David (1995).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Hobsbawm, Eric. & Terence Ranger. eds.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tchinson, John. & Anthony D. Smith. eds. (1996). *Ethnicity*,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tchinson, John. & Anthony D. Smith. eds. (1994). *Nationalism*,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sing, You-tien (1998). *Making Capitalism in China: The Taiwan Connection*,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yce, Patrick ed. (1995). *Clas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rasner, Stephen (1999). *Sovereign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ee, Chyungly (1997).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Do State Policies Matter?", *Issues & Studies*, 33: 7, pp. 40-61
- Leng, Tse-Kang (1996). *The Taiwan-China Connection: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Boulder, CO: Westview.
- Leng, Tse-Kang (1995). "State, Business, and Economic Interac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ssues & Studies*, 31: 11, pp. 40-58.
- Lin, Nancy Yuh-Jiun (1996). "A Review of Cross-Straight Trade Development," *Issues & Studies*, 32: 4, pp. 46-59.

- Lin, Nancy Yuh-Jiun (1997). "Does Taiwan's Intra-Industry Trade with Mainland China Deviate from General Pattern?", *Issues & Studies*, 33: 3, pp. 86-97.
- Nimni, Ephraim (1991).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Theoretical Origins of a Political Crisis*, London: Pluto.
- Ong, Aihwa. & Donald Nonini, eds. (1997).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Ong, Aihwa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Robertson, Roland (1992).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 Sassen, Saskia (1996). *Losing Control? Sovereign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assen, Saskia (1998).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Essays on the New Mobility of People and Money*, New York: New Press.
- Sassen, Saskia (1999). *Guests And Aliens*, New York: New Press.
- Sassen, Saskia (2000). *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 Shaw, Martin (1994). *Theory of the Global State: Globality as an Unfinished Revolu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Anthony D.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UK & Cambridge, US: Blackwell.
- Tso, Allen Y. (1996). "Calculating Cross-Strait Trade: An Analysis of Statistical Methods," *Issues & Studies*, 32: 6, pp. 37-54.
- Tso, Allen Y. (1996). "An Analysis of the Trade-Investment Relationship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ssues & Studies*, 32: 8, pp. 54-72.
- Tu, Wei-ming, ed. (1994). *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urkle, Sherry (1995).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Touchstone.
- Tumin, Melvin. M. (1967).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 Forms and Functions of Inequali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Wang, Gungwu (1999). "Chineseness: The Dilemmas of Place and Practice," in Cosmopolitan Capitalists: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ed. Gary G. Hamilton ,Seatt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18-134.

- Weiss, Linda (1998).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Ithaca &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u, Jieh-min (1997). "Strange Bedfellows: Dynamics of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Local Authorities and Taiwanese Investo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6: 15, pp. 319-46.
- Wu, Yu-Shan (1995). "Theorizing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 Analogy with Russia and Its Neighbors," *Issues & Studies*, 31: 9, pp. 1-18.
- Yeung, Godfrey (2001). *Foreign Invest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Case of Dongguan*, (London: Palgrave.
- Yeung, Y. M. & Sung Yun-wing, eds. (1996). *Shanghai: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zation under China's Open Polic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